

日本二战后最大规模情报重组—— “特高课重现”？

不久前的7月31日,东京永田町的首相官邸,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主持首届全国“国家情报会议”,讨论制定日本首个国家级情报战略。同日,日本国家情报局,正式挂牌成立。

这是日本自1952年以来最重大的情报体系重组,也是二战后日本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中枢。

二战时,日本曾拥有高度集中的战时情报体系,并将信息控制服务于战争动员。战后,在美国占领当局主导下,日本拆解原有情报机器,建立起分散制衡的情报结构。

如今,时隔八十多年后,日本再次推动情报体系向中央集中。外界质疑,日本是否在重建类似二战时的谍报机构“特高课”。

伴随着国家情报局成立,日本自卫队也在同步推进情报领域的重大改组。日本情报能力的提升,与军事领域的激进转向,形成了系统性共振。

“军事行动空间扩张必然产生更高层次的情报需求,而统一情报中正成为日本推进‘能战国家’的关键基础设施。”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分析,过去日本情报体系“各自为政”,主要满足预警和防御需求。如果意在强化“反击能力”,就必须掌握目标位置、兵力部署、指挥体系以及战场动态。

“情报能力建设与其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各有独立的政策逻辑,但近年来明显呈现相互强化、同步推进的趋势。”陈洋分析。

变化 重组情报体系

7月31日,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揭牌。现场照片中,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与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原和也,手扶着印有“国家情报局”的牌匾。

原和也曾历任日本警察厅外事课课长、警备局局长等职务,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。据日本内阁官房公布信息显示,正式挂牌后,该机构将取代原有内阁情报调查室架构,统筹协调分散在各政府部门约3.3万名情报工作人员。

据日本国会4月通过的法案,未来日本将以“国家情报会议”为核心,“国家情报局”为执行机构,负责统筹安全保障、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“对外情报活动”。国家情报局除了承担自有事务外,还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具有综合协调权。

陈洋分析,法案赋予了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更加明确、稳定的制度地位,把情报收集、共享、分析和政策运用纳入相对完整的国家体系中。改革后,日本从“官邸掌握情报”转向“国家统合情报”,从“行政协调”转向“制度化统合”。

二战后的数十年,日本情报体系“散装化”,情报收集依赖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零散机构。日本内阁官房网站公开信息显示,当前日本情报体系由五个核心机构组成,涵盖对外、国防、国内安全和执法部门等。

“公安、外务省、防卫省情报部门彼此独立、相互竞争、资源壁垒森严,形成典型的‘竖井式’碎片化格局,延续战时陆海军情报内耗问题,整体情报效能低下、缺乏统一战略统筹。”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国际政治学教授理查

德·塞缪尔斯说。

作为主要协调机构的内阁情报调查室,名义上为日本最高情报机关,本质上却相当于“情报收发室”。

“内阁情报调查室战略职能相对薄弱,本质上仍是内阁官房内部的一个行政机构,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跨部门指挥权限。而日本国家情报局兼具基于首相官邸、日本国家情报会议的要求,具备直接向各省厅下达情报搜集与分析指令的职权。”陈洋表示。

这一次,也是二战后日本在国家情报体系的突破。

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秦立志认为,其核心意图是整合国内的战略共识,以应对假想的外部安全威胁,这是日本未来走向进一步军事化的重要一步。

背后 保守派数十年推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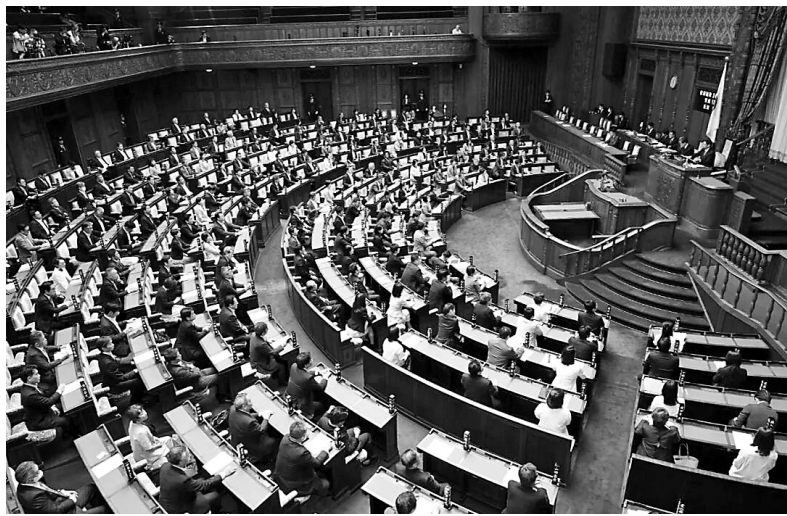
此次日本情报体系的改革,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无疑是幕后推手。

今年4月23日,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法案。两个月后,在内阁会议上敲定该机构首任局长原和也。当前的“国家情报会议”则由首相高市早苗担任议长。“国家情报局”则直接隶属于首相府。

其实,国家情报局的成立,并非高市早苗的独创设计,而是日本保守政治持续了数十年的尝试。

二战后,建立类似美国CIA式的情报中枢,是日本保守派长期以来的企图。

“不过,民众因战时特务统治的历史记忆,长期抵触情报扩权,使情报改革成为政治禁忌。各官僚部门固守权力地盘,派系内斗阻碍体系整合。”塞缪尔斯强调,战后和平主义体制弱化情报建



当地时间2026年5月27日,日本参议院在全体会议上通过成立新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法案。

设,叠加美国长期管控、主导日本情报事务,压缩其自主改革空间。

2006年,安倍晋三首次出任日本首相后,曾试图推动国家安全体系改革,力主成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,但最终未能成功。

一起海外人质危机,加速了日本大规模的情报体系结构性变革。

2013年1月,阿尔及利亚东部天然气田遭武装袭击并发生人质劫持事件,造成10名日本公民死亡。日本是此次事故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。

事后,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领导的政府小组发布19页临时报告,指出政府在搜集营救日本人质所需的情报方面行动迟缓。他呼吁首相官邸进行改革,以消除各部委之间的部门主义。

人质危机事件发生次月,安倍内阁便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立咨询委员会,并于同年底正式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。次年1月,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,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执行机构。“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立,有效压制官僚派系恶性竞争,为统一情报改革扫清制度障碍。”塞缪尔斯表示。

以“安倍继承者”自居的高市早苗,延续了安倍内阁打造情报中枢的政治遗产。比此前更有利的是,高市早苗面对的是一个右倾化的日本。

“民众战时负面记忆淡化,叠加日本政府持续进行外部安全叙事渲染,社会对情报能力、网络情报防控的接受度大幅提升。”塞缪尔斯表示。

陈洋亦认为,日本民众对于情报机构扩权的抵触情绪正在减弱。在此舆论背景下,日本政府顺势以“国际环境日趋严峻”“防范外国势力不当干涉”为由,推动立法设立统一的国家情报局,为情报体系整合争取必要的社会接受度。

此外,多位受访专家均指出,日本国家情报局迅速落地,离不开美国的实质性松绑。

“美国乐见日本情报、反间谍、网络能力升级,可分担美国亚太战略压力、强化同盟干预能力,因此对改革持默许与支持态度,日本借此谋求有限的情报自主,弱化对美长期依附。”塞缪尔斯表示。

质疑 “特高课”重现？

国家情报局的设立,引发了日本国内的警惕。

5月12日,在“国家情报会议”设置法案于日本参议院开始审议之际,上千名民众聚集在众议院外,手持荧光棒和自制标语牌,高呼“不要剥夺自由”等口号。

日本民众的抵制,源于对二战前和战争期间日本“特高课”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、实施思想监控的担忧。

实际上,自情报改革酝酿之日起,日本内部就一直存在质疑声音。

据央视新闻报道,在野党“中道改革联合”代表小川淳也曾在众议院会议上指出,“国家情报局”搜集的情报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。

另据《人民日报》报道,日本社民党干事长、参议院议员拉沙尔石井表示,“国家情报局”将是缺乏监督的情报机构,最终只会沦为执政党的“打手”。

然而,随着高市率领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,这项改革议程获得选举结果赋予的政治正当性。“更为关键的是,相关法案最终取得跨党派支撑,有效弱化国会层面的阻力,为法案顺利落地扫清关键政治障碍。”陈洋表示。

如今,日本国家情报局已正式挂牌,质疑者的担心会成为现实吗?

多名中方受访学者认为,日本此次情报体系改革,并不仅仅是行政重组,还是塑造“能战国家”的一环。

“尽管国家情报局本身并不等同于进攻性情报机构,但高市政府强调发展‘反击能力’,客观上正在推动日本情报体系由传统的‘防御型情报’向‘战略型、攻防一体型情报’转变。”陈洋表示。

“日本一直在谋求情报体系自主性,若相关议程落地,日本将逐步构筑起一张全新的情报网络。”秦立志表示,日本不止于被动适应地区安全格局变化,还意图“反向塑造”并主导地区安全态势。“小碎步”调整可能会形成大的战略趋势,助力于日本突破二战后对外扩张和安全战略调整的限制。

据《南方周末》